

金融危机下沿海外贸企业生存调查②

一家服装厂倒闭的背后

■本报记者 戴明阳 叶小钟

“如果你下个星期再来虎门,我这个服装加工厂就不复存在了。”王海联用一块布料擦拭着办公桌上的座机——这部电话机上落了一层灰尘,显然“无人接听”状态已有一段时间了。

王海联告诉记者,最近正忙着为自己的工厂“料理后事”。

他的工厂位于虎门镇一条偏僻的小巷内,极难寻找。虎门镇是东莞八大支柱产业之一——服装业的重镇,这里是服装加工企业的聚集地。在东莞市的外贸出口中,虎门一直占据很大的比重。去年以来,虎门镇一部分外销的服装加工厂,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倒闭、停业。这种局面,今年还在持续。

究竟是哪些原因导致了这些企业的消亡?

王海联是记者能够找到的唯一愿意接受

采访的老板。这位“混迹”于虎门服装业十多年的汕头籍老板说:“周围倒闭企业的老板我都认识,但你就别费心找他们了。因为每一家倒闭企业屁股后面都有一笔糊涂账,躲还来不及,哪有心思在媒体面前说东说西呢。何况这又不是什么好事。”

记者见到了王海联的工厂。厂区分外冷清,所有机器已经停止运转,上面蒙着厚厚的一层灰尘。北面仓库内堆放着大量的原材料,由于长时间没有开工,最下面一层的材料已经霉变了。

厂区内,工人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聊天、打牌,有的看小说、听音乐。

“平均每天走3到5个工人。”王海联说,“现在还剩下不到30名工人。金融危机之前,我这里有980名员工。我还开设了分厂。”

“拿不到订单,每天的人力成本、厂房租金、水电开销近10万元,实在是吃不消了。”王海联的工厂是承接服装订单的外向型服装加

工企业,产品销往美国。由于是贴牌生产,没有技术附加值,利润十分微薄。

“现在每天的开销都是前两年的积累,老板快吃光了!”王海联认为,在东莞的100多个汕头老乡和他的情况大同小异,到今年年底基本上不会有人再把企业办下去。

在虎门镇的街上,记者观察到不少商铺贴着“此房出租,价格面议”的广告。据当地人称,2008年前,要想在这里租一块不足5平方米的商铺,是很困难的。现在,这样的广告也在王海联的工厂大门上贴着。

对于破解之策,王海联的选择是“关门”。“这样能损失少点。”王海联皱着眉头说:“我再观望一阵,要是再没有单子,就关门回老家。”

他最近经常上网看看国外的经济走势和出口情况,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近几个月状况不会有好转。”

对于王海联工厂的命运,记者曾在广东

采访期间询问了一些专家、官员。他们的分析,或许能揭示出一些原因。

广东国欣律师事务所专职代理破产案件的律师李晚涛的判断是:“没有品牌、没有渠道、没有融资能力的中小企业,自身就是一个机理不健全的实体,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是很容易倒掉的。”

东莞纺织行业协会一位不具名的业内人士分析,低端的订单式生产模式、生产设备技术落后,没有自己的品牌等因素,会让类似王海联的企业在产业链中没有话语权,更没有定价权,不仅缺少竞争力,抗风险能力也低。这是这些企业倒闭的内在根源。

在广东采访期间,记者还听到了一些业内人士的说法:“倒闭企业多数都不符合政府产业调整倡导的方向。”

东莞市政府几年前就开始提产业升级。而王海联的工厂现在还是全部用人工织机进行生产。对此,王海联说,资金这么紧,买电脑

织机要花很多钱。我知道,升不了级早晚会被淘汰。他承认,这是他的工厂即将倒闭的原因之一。

在珠三角地区,倒闭的企业不仅仅限于服装业,还有鞋业;也不仅仅限于小企业,还有中型甚至大型企业。对于倒闭的原因,那些身在金融风暴之中的企业老板们也提供了一种分析。

在东莞厚街镇鞋材加工行业摸爬滚打近9年的和冠塑胶制品厂厂长袁福福说,目前在东莞倒闭的出口导向型企业有三类——

“第一类是恶意倒闭的,台资、港资等外资企业居多,大多是内部管理本来就不适应市场要求,金融危机一来就没法支撑了。在东莞,许多港资企业是租赁厂房,走两头在外的初级加工模式,一旦感觉不好赚钱了,少数不良的企业主就在一夜之间跑掉。”

“第二类可以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来说。绝大部分倒闭的小企业是依托大企业,大企业经营不善,投资失败倒闭,依附他们的小企业自然就关门歇业。”

“第三类是本身没钱没实力的‘内资’经营者,只是前几年看到鞋业利润高速增长盲目跟风,这些企业早就应该倒掉。这类企业的倒闭和金融危机没什么直接关系。”

结束对王海联的采访时,他的烟灰缸里已经堆满了烟蒂。记者注意到,他的办公室里值钱的家具体基本上空了,只有墙上的一个挂钟,还在滴答滴答地正常“运转”着。

“如果时间能倒转就好了。”王海联说。

农业部、财政部多措并举,让社会监督——阳光操作保障农机购置补贴落实

本报北京3月20日电(记者高莎)为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农业部、财政部建立和完善补贴操作办法,多措并举,阳光操作,取得明显成效。

这些措施有:一是公开政策内容,接受社会各界监督。每年农业部、财政部确定年度农机购置补贴实施方案后,都通过媒体公布补贴重点、补贴对象、补贴范围、补贴指标等,目的是让农民了解政策便于申请,让企业了解政策提供产品,让社会了解、监督政策的落实。

二是公开机具选型,搭建公平竞争平台。三是公开受益对象,确保补贴落实到位。

四是公开测算依据,公平合理分配资金。财政部、农业部根据各地的耕地面积、农作物面积、粮食产量、粮食商品量、农机化水平、畜产品产量等指标,运用公式法和因素法,将中央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科学、合理地分配到各省(区、市),引导和鼓励各地重粮抓农。

东北亚博览会国际性日益突出

第五届博览会将于9月2日至6日在长春举办

本报北京3月20日电(记者刘津农)记者从吉林省政府今天在京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经过四年的发展,“中国吉林·东北亚投资贸易博览会”(简称“东北亚博览会”)规模不断扩大,层次不断提升,国际性日益突出。今年9月2日至6日在长春举办的第五届东北亚博览会,出席的国内外客商将达到1万人以上。

据介绍,四年来,每年参加东北亚博览会的世界500强企业始终保持60-80户之间,参会客商总数由3万人增至5万人。博览会对外贸易成交额大幅上升,由第一届的2.92亿美元增长为第四届的4.75亿美元,吸引域外投资则由753.94亿元增长到1008亿元。

更为突出的是,以东北亚博览会为载体举办的国际会议及活动影响日益深远,东北亚各国高层交流对话日益密切,今年博览会,将共同探讨在金融危机的形势下,如何解决东北亚经济合作、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大图们江流域开发过程中面临的资金、技术、物流等方面的突出问题,实现互利共赢。

世界低碳与生态经济大会

11月将在南昌举行

本报讯(记者李秀玲)由国家发改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商务部、科技部、环保部等部委和江西省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世界低碳与生态经济大会暨技术博览会”将于11月18日至21日在南昌举行。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加速,能源使用带来的环境问题及全球气候变暖,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生存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已成为世界各国迫切需要共同解决的重大课题。多年来,江西省坚持既要金山银山,更要青山绿水的发展观念,从源头上控制高耗能、高消耗、高排放产业发展,实行环境保护一票否决制和责任追究制。地处江西的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使其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候鸟保护区,是世界自然基金会划定的全球重要生态区、中国唯一的世界生命湖泊网成员,被称为中国的“大陆之肾”。江西推进低碳与生态经济发展的实践,为大会在江西举办创造了条件。

张家梁矿压缩项目投资800万元

本报讯(记者张世斌 通讯员付俊国)近日,河北张家口矿业集团张家梁煤矿面对金融危机影响,对2009年各项投资计划进行了“会诊”,取消投资项目4个,暂缓项目5个,须优化项目方案4个,可减少该矿项目投资800余万元。

矿业是一个新建矿井,需投资的项目很多。由于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煤炭市场疲软,煤矿的经营也面临着考验。为此,该矿对一些项目进行了压缩。

家电下乡:农民为何看的多买的少

——记者下乡采访调查原因

■本报记者 肖树臣
■本报通讯员 李承锦

“家电下乡补贴政策好是好,可产品种类少,领取补贴手续多,售后服务不够好,甚至有些补贴商品的价格比城里功能好的家电打折后还要高,这让我们怎么能掏腰包啊?”近一段时间,记者在河南一些县采访时,许多农民对家电下乡既心存疑虑,又有更多的期盼。

自2007年底中国启动家电下乡试点以来,家电下乡政策对农村消费市场的带动作用正在显现。河南省是最早实施家电下乡试点的省份之一,年销售家电下乡产品160万台(件),实现销售20亿元,已发放补贴1.3亿元。

然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家电下乡启动后,由于政策宣传、财政款项、人员培训都没有及时跟上,以致使许多农民对这项惠民政策仍处于观望态度。

补贴款半年都领不到手

3月15日,记者来到周口市西华县,虽然满街都是赶集的人,但家电下乡的销售点,却没有多少人光顾。

“家电下乡,不先要让乡人买得起,还要用得起才行啊。”一位农民说,电脑下乡是对咱农村人的好政策,能够了解信息,开阔眼界。可一年六七百元的上网费,让我们不得不算计。

还有一位农民反映,联想389手机定价699元,补贴以后是608元,但实际上不用享受补贴,只花500元就能买到同样是正品的行货,那么家电补贴到底富了谁?

来自孟州的一位农民反映,2008年6月份买的冰箱,买时被告知“补贴最多15个工作日可以到账”,但一直到去年12月份,补贴款迟迟不到位,这位农民往返于当地商务部门和财政部门多次,都没有拿到补贴款,对此一肚子怨言。

家电下乡掺“水分”

部分家电下乡产品价格偏高,是农民普遍

反映的问题。

据了解,家电下乡产品说明书中规定:“投标机型的销售价格不得高于同期同型号产品的市场售价。”但实际情况如何呢?

据了解,家电下乡推广以来,有些商家打着家电下乡的幌子,借机推销一些销路差、质量不好的非中标产品,一些经销网点甚至偷偷把价格抬高20%,再降价13%销售,而许多农民却被蒙在鼓里。虽然知道下乡家电有13%的补贴,但不知道家电的限价,很可能上当购买高价家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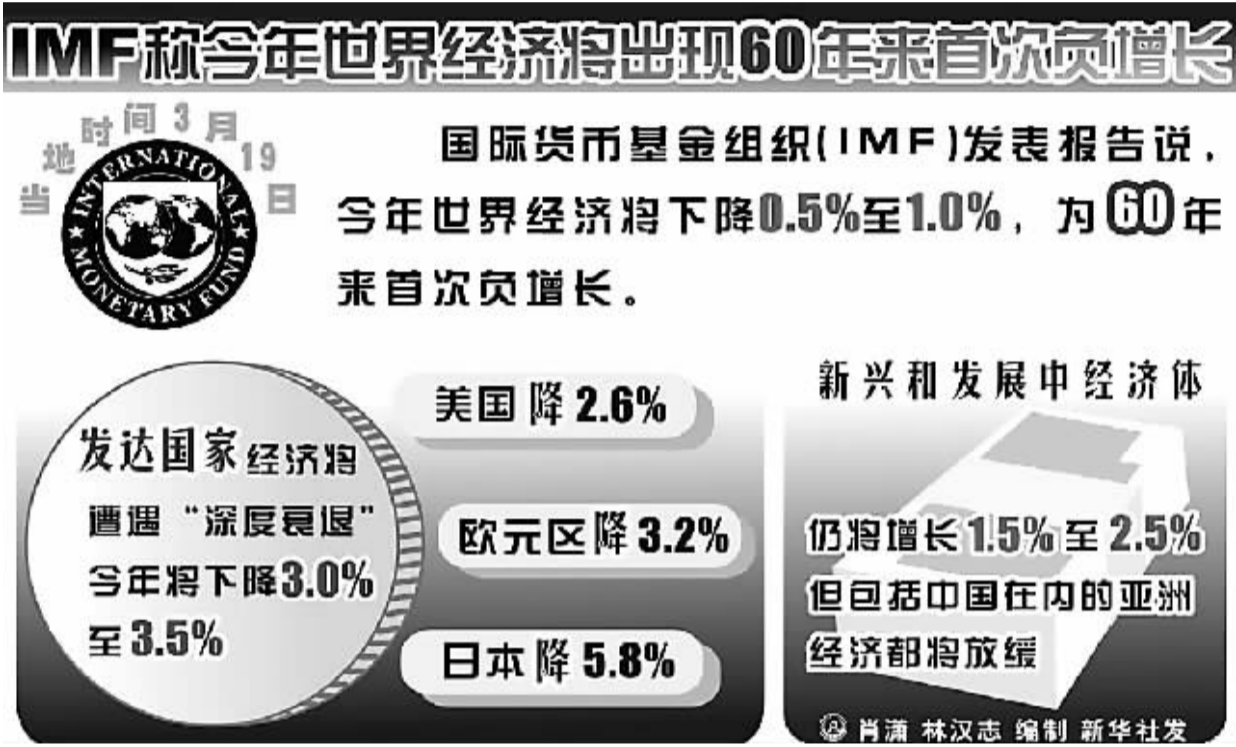
另外,家电产品尤其是手机一类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周期快,某些产品在购买后短时间内就降价,市场价格变化使下乡家电的价格处于不易控制状态,而通过招标形式确定的价格存在一定程度的时间滞后,因此如何将定价机制设计得更加灵活合理,这些都对政府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期盼贴近农民意愿

“很长时间农村市场都成为企业遗忘的角落,我们的消费习惯、消费水平他们都不了解,更别说销售渠道、定价方式是不是适合我们农民啦。”记者在调查中,许多农民期望“家电下乡”能更贴近农民意愿,推出适合农村市场的产品。

在刚刚闭幕的两会上,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建议,取消下乡家电招标确定的方式,让厂家充分竞争。这样不仅尊重了农民选择权,制造、流通企业也获得公平待遇,同时,还能杜绝某些部门在招标环节中腐败和不当渔利的机会,维护政府的公正性。同时,建议由商务部确定开设“家电下乡”网上商城,可以查询“家电下乡”相关资讯及预订。

同样,杜绝“水货下乡”需要企业诚信和政府监督。进行从严的全程监控,堵死产、供、销、补各环节中的漏洞,杜绝不法商人销售“假家电”,避免农民利益受损害,使“家电下乡”工程真正成为“惠民工程”、“民心工程”。



部分农民工求职未果 滞留城市摆地摊过渡

新闻特写

■本报实习生 李静林

金融危机让一些农民工失业,他们当中有些因为各种原因滞留在原来打工的城市。为了生活,一些人不由而同地选择了摆地摊谋生作为过渡期,以暂时解决吃饭问题。每当华灯初上之时,京城许多路口都摆满了各种地摊,人们不得不穿插着通过。有些居民反映,今年地摊规模大大超过往年同期。

在农业大学校门口的道路两旁,有卖菜刀的、卖菠萝的、卖煎饼果子的几个地摊,摊主都是农民工。卖菜刀的老板说,他们都是刚入这一行,在帝都熟悉的同乡中,有42个人推着同样的车,卖着同样的货。他们出售的都是一些日常家居用品,杯子、碗和碟子等。货都是从同一个老乡那边转过

来的。老黄拿起一个做工精良的瓷杯说:“售价是5元。这种杯子走得很好,我拿货价超过4元,卖一只利润不足1元,有时一天卖得少,连饭钱都不够。”

“我们这42个人有一半是今年才开始干的,和我一样,都是外地来京找工作的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先在京城摆地摊吧!”老黄说。

今年第一次来北京的老黄,有过几次找工作的经历,但都没成功。在老黄看来,自己以前有过各种工作经历,有一定的工作经验,目前推车摆地摊是迫不得已。他将自己的处境归结于金融危机。

“就算是一种过渡吧。”老黄有些无奈地说。

在老黄地摊不远处,有一位大妈的煎饼果子摊。这位大妈以前在北京一家保洁公司工作,今年公司没有让她继续上班,但

新华社北京3月19日电 20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帕巴拉·格列朗杰题为《西藏社会历史的伟大飞跃——纪念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的署名文章,全文如下:

50年前的西藏民主改革,是彻底埋葬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一次伟大社会变革,是西藏百万农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现自我解放的一场大革命。通过民主改革,百万农奴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民族的繁荣进步,为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走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条件,开创了西藏与全国人民一起走向现代化的新纪元。

西藏的封建农奴制,经过漫长的发展,逐步形成了政教合一、以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和农奴对封建领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为基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这一制度的特征:从生产资料的占有上看,占总人口不到5%的三大领主(旧政府、贵族和上层僧侣),几乎占有了西藏全部土地和绝大部分牲畜;对农奴的人身占有生产,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没有生产资料,不得不依附于三大领主,因而也没有人身自由;从政权性质上看,政权与教权相结合,从政治和精神上对人民实施残酷的阶级统治和压迫。在这一制度下,西藏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口急剧下降,农牧生活极度困苦,整个社会经济文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原西藏地方政府签订的《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即《十七条协议》)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主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办法解决之。”从1951年5月到1959年3月,在西藏和平解放后长达8年的时间里,党中央坚决维护和执行

《十七条协议》,实行慎重稳进的方针,力争经过长期的工作和耐心的等待,团结争取一切可以团结争取的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用和平、自动的方式稳妥地推行民主改革。但是,旧西藏封建农奴主阶级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把中央在改革问题上对他们争取、教育和一再等待视为“无能之举”和“软弱可欺”,他们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欺骗群众,掩盖阶级矛盾,反对改革,极力维护农奴主阶级的统治。1959年3月10日,在帝国主义的策划、怂恿和支持下,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公然撕毁《十七条协议》,悍然发动了妄图分裂祖国、永远保持封建农奴制统治的全面武装叛乱。面对境内外分裂主义集团的猖狂行径,中国共产党团结和领导西藏各族人民,迅速平息武装叛乱,全面实施民主改革,分裂主义势力受到沉重打击,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得以坚决捍卫,在西藏延续千百年的封建农奴制由此也走到了历史的终点。

此后开始了西藏百万农奴在党的领导下实现自我解放,成为西藏历史发展的重要分水岭。西藏民主改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党中央根据西藏人民的强烈要求,在西藏全面推动民主改革运动,在提出“充分发动群众,边平边改,先叛先改,后叛后改、未叛地区暂时缓改”方针的同时,针对西藏社会历史发展的特殊情况,采取了不同于内地的特殊措施。西藏的民主改革分两步进行,第一步实行“三反双减”,即反对叛乱、反对乌拉差役、反对人身依附和减租减息;第二步分配土地,将没收和赎买农奴主的土地等生产资料分配给农奴和奴隶。党中央还制定了一系列符合西藏实际的政策措施。对叛乱的农奴主的生产资料实行没收。对未叛乱的农奴主实行赎买政策,由中央出钱赎买其多余的生产资料,分配给农奴。对爱国人士,实行团结、教育的政策并就改革的有关重大事宜同他们进行协商。认真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实行行政统一、政教分离,废除寺庙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和封建特权,同时保护人民群众正常的宗教生活。反帝爱国统一战线增加了赞成民主改革的内容,发展为人民群众统一战线。为推动西藏社会的发展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1959年3月到1961年底,西藏民主改革经过两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完成,西藏工作由

人民日报刊发帕巴拉·格列朗杰署名文章

西藏社会历史的伟大飞跃

——纪念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

此进入了稳定发展阶段。1961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西藏工作方针》中指出:“社会制度经过改革,从封建农奴制度改变成了农民个体所有制,要安定一个时期”,让劳动人民个体所有制稳定下来,让农牧民的个体经济得到发展,让翻身农奴群众确实尝到民主改革给他们带来的好处。1965年9月,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开始在西藏全面实施,西藏人民从此享有了自主管理本民族事务的权力。实践证明,西藏实行民主改革,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全国各民族一道走向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光辉道路,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是西藏人民的历史选择。

三

民主改革50年来,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西藏工作,深切关怀西藏人民,先后召开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根据西藏实际,制定并采取了一系列特殊优惠政策和灵活措施,为西藏的发展稳定创造了诸多有利条件,极大地调动了西藏各族各界群众建设美好家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西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拉萨制造的“3·14”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自治区党委团结带领西藏各族人民进行坚决的斗争,一举平息了事态,夺取了这场斗争的重大胜利。当前,西藏社会保持基本稳定,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民族团结,边防巩固,人民安居乐业。

回顾西藏民主改革50年来发展的进程,我深深感到:实行民主改革,是西藏社会实现伟大飞跃的关键抉择;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西藏发展进步和西藏各族人民的前途命运才能充满更大的希望;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坚定不移走有中国特色的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不断提高各族群众的生活水平,西藏的未来才能更加繁荣昌盛;只有坚决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切实打响各族各界共同团结奋斗、共同团结进步、共同团结发展的思想基础,才能创造西藏各族人民今天幸福美好的生活和更加灿烂

的明天。在我们隆重纪念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欢庆“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之际,这赖集团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支持怂恿下,加紧进行各种分裂破坏活动,其目的在于分裂祖国,恢复他们失去的特权,恢复他们对西藏人民的反动统治。面对这赖集团及其西方支持者的分裂破坏活动,西藏各族各界群众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新局面,进一步认清了这赖集团分裂祖国的反动本质,增强了保卫民主改革和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伟大成果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反对分裂、维护稳定、促进发展是西藏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这赖集团的分裂破坏活动违背历史,不得人心,终将历史和人民所唾弃;这赖集团倒行逆施,妄图将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是永远不会得逞的;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西藏各族人民对祖国的繁荣富强感到无比自豪,对西藏未来的发展和进步充满信心。